

刘明华教授对话传习志愿者： 杜甫在成都的生活 为他的作品增添了色彩

4月26日，“名人大讲堂”正式开启“杜甫文化季”。西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刘明华入川，以《杜甫的民胞物与情怀》为题，带领观众走进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杜甫的一生，了解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在讲座结束后，四位来自不同学校的青年传习志愿者继续向刘明华教授请教关于杜甫“民胞物与”情怀的相关问题。

传习志愿者肖奕慧向刘明华教授请教，杜甫一生中经历了很多常人无法体会的苦难，这些苦难与他的“民胞物与”情怀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在讲座中，刘明华教授曾经讲到过相关的内容，他总结道：“杜甫经历的很多苦难，是其他诗人所没有经历过的。正因为他经历了这些苦难，所以他在表现自己苦难的时候，那些诗本身就觉得很感人。但他在表现自己苦难的时候，同时又想到了天下人的苦难，这就让他的诗歌有了更多能够打动人的气质。”

另一名传习志愿者陶姝岚对杜甫年少时候写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颇感兴趣。她向刘明华教授请教，年少的杜甫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了这样的理想。而这一理想，又是如何影响了杜甫这一生？

“他这一首诗的全称叫做《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在学术研究中叫做干谒。这首诗是他在长安十年期间所写。”刘明华教授说。直到杜甫30岁左右，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他回到了长安，开始给朝廷的官员们写诗，试图获得推荐，帮助他在考取仕途的路上谋个一官半职。“‘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是杜甫最悲惨的一个时期，他在诗中大倒苦水，但也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



刘明华教授生动阐释杜甫的中国人道主义精神。



传习志愿者向刘明华教授请教。

俗淳’。杜甫生于官员家庭，他生来就认为要利国利民，帮助皇帝治理天下，让天下的风俗回归到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时代。”但刘明华教授同时说，也正是这样的理想和他“出于公心、坚持正义”的性格，让杜甫“倒了霉”。

“杜甫任左拾遗的时候，就是因为他

不认同皇帝的一些决策，讲话也很直接，皇帝对他不满，动了杀心。但是因为有人为他求情，提出左拾遗的职责就是给皇帝提意见，这才免于死。”后来，杜甫便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再后来就到了成都，开始了他漂泊的生涯。刘明华说，这句诗是杜甫远大理想的一个最真实的表现，他曾经有机会接近这个理想，但也正是因为他的理想和性格不能为皇帝所容忍，而离开了政坛。

第三位传习志愿者赵越起则向刘明华教授请教，居住在蜀地，对杜甫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杜甫现存作品的绝大部分，是他到了四川以后写的，这是很了不起的。”刘明华教授说。在入蜀之前，杜甫已经有了一些堪称伟大的作品，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反映战争带来的苦难、批判社会不公的

作品。“这些诗已经能奠定他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是他到了成都以后的作品，可以说奠定了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刘明华说。

刘明华认为，杜甫来了成都以后风格大变。因为他远离了官场的烦恼，远离了战争。同时，在朋友的帮助下，杜甫得以在草堂落脚，体验到成都的优美风景，度过人生中相对安逸的时光。“这段时间在成都的生活，为杜甫的作品增添了五彩斑斓的色调。”刘明华教授举例道，“‘仰面贪看鸟，回头错应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只有人很闲适、心情很愉快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经历。成都，让杜甫高高兴兴地生活了几年。”

最后一位传习志愿者王邵佳则向刘明华教授提问，“三吏三别”对后世诗歌创作有哪些方面的影响？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也是早期批判现实的一组优秀作品。它的巨大价值和崇高地位，体现在它的写作方式和写作内容。”刘明华教授说，他最喜欢的就是《石壕吏》和《新婚别》。在讲座中，刘明华教授曾讲到，杜甫对战争的批判，是出于对民众的同情，而不是战争的正义与否。因此他在作品中反对的，是征兵过程中“非人”的举措，“可能是兵役”，“也可能是繁重的劳役”，刘明华教授认为，这一点在《石壕吏》中体现得非常清楚。

“无论战争是正义还是非正义，只要这些‘吏’在执行规定的时候不考虑具体的情况，为了完成指标和任务而做不好的事情，杜甫都不赞成。所以他的本质出发点，是对民众的关切，对人民的爱。”刘明华如此理解杜甫的心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摄影 杨涛

现场观众盛赞：一次干货十足的分享

4月26日下午，“名人大讲堂”迎来“杜甫文化季”首场讲座，刘明华教授的精彩阐释，令现场观众纷纷点赞。

来自成都锦城学院汉语言专业的刘同学直言：“今天的讲座非常好，通过刘教授的介绍分享，我意识到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茅屋’其实是一种象征指代，我也更加深入地了解杜甫身上的悲剧精神与牺牲精神，正是这种宁愿为了天下人牺牲自我的精神，令我十分动容。”

西南民族大学在读研究生徐佳表示：“刘教授所讲述的杜甫身上‘推己及人’的情怀精神，让我印象颇为深刻，杜甫由自己不幸的亲身经历，推及到更多比他生活更贫困、更苦难的人身上，使杜甫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也让我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有了更丰富的理解。”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讲座最后，长期从事国学诵读研究的著名主持人海光，即兴朗诵了杜

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刘明华教授现场竖起大拇指点赞道：“点睛之笔”。

“作为非常喜欢亲近杜甫的成都人，有这样能够调节气氛、助演的机会，我是非常乐意通过朗诵来‘助演’的。”在海光看来，此次讲座中既有思想干货的分享，又有活泼生动的形式，“能够把中国文化的精髓提炼出来，让更多人接受文化的熏陶。”

对于刘明华教授渊博扎实的文化知识，以及在讲座上深入浅出的分享内容，

海光也是赞叹不已。“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先生有关‘民胞物与’概念的解读，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概念并不熟悉，但是它却是中国思想中的精华。刘先生博览群书，深入研究杜甫的思想，他能把这种古代优秀思想文化提升淬炼至现当代的运用上，有助于杜甫走向世界，我认为这是一次干货十足的分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荀超
实习生 汪灵

向以鲜：如何理解杜甫的苦难书写？

嘉宾观点

嘉宾介绍：

向以鲜，诗人，随笔作家，四川大学教授。著有学术专著《超越江湖的诗人》《迷官与玄珠》《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诗集《我的三部曲》“旋律三部曲”及长篇历史剧《花木兰传奇》等。获教育部人文社科奖、纳通国际儒学奖、四川文学奖、首届杨万里诗歌奖、李白杯诗歌奖等。

杜甫及其诗歌，艺术能量巨大，已成为滋养后世一道不可或缺的强大精神资源。在4月26日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首期讲座举办之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也约访到国内研究杜甫的多位资深人士，谈谈他们心目中的杜甫。其中一位，便是集学者和诗人双重身份于一身的向以鲜。

2021年12月，向以鲜的《盛世的侧

影：杜甫评传》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被业内认为是一位教授诗人的“诗教心传”，是以诗解诗的成功尝试。“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喜欢杜甫，这种喜欢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浓重。因此，写这部书，在很大程度上是还是一个久远的夙愿。”向以鲜说。

上元二年(761年)的秋天，杜甫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句子。杜甫对自身、对同胞的态度推演到了对待外物之上，显示出“民胞物与”的襟怀。由此，向以鲜感叹道：要能做到民胞物与，那得经历世间所有苦难才行。没有经过真正苦难的人，其所谓的“民胞物与”，不过是一句浮云般的自我标榜而已。

杜甫的诗歌似乎天生即与苦难相随，与孤独为伍，诗歌是黑暗中的星辰，绝望中的灯火。杜甫的确经历过很多苦难，就算是没有安史之乱，杜甫也算是一

个饱经劫难的人。时代的苦难(南北逃世难)，理想的苦难(许身一何愚)，仕途的苦难(青冥却垂翅)、个人的苦难和身心的苦难，可谓无不备。

有人说，一场安史之乱虽然毁了大唐盛世，却成就了一个伟大的诗人。明人谢榛就说：“子美不遭逢天宝之乱，何以发忠愤之气、成百代之宗。”安史之乱的血与火，让杜甫的诗歌闪着炼狱般苦与痛的光芒。诗人从痛苦与疼痛的锐角，向汉语的底层和内部无限掘进，并且展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和感动力。

不过，向以鲜认为，其实在安史之乱之前，杜甫就已经展现出了惊人的才华，他已经写出《望岳》《房兵曹胡马》《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饮中八仙歌》及《兵车行》等传世名篇。“这些诗篇已足以令杜甫成为唐代杰出的诗人。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我们看见的杜甫，一定不是现在的杜甫。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仍然是

伟大的诗人杜甫。他的才华摆在那儿，他的胸怀摆在那儿，他的眼光摆在那儿，他的沧桑诗心摆在那儿，他对汉语无与伦比的驾驭力摆在那儿。”

宋人黄庭坚理解杜甫的愁苦，他在《老杜浣花溪图引》一诗中写道：“中原未得平安报，醉里眉攒万国愁。”杜甫的忧愁和苦难，并不只是来自自身，更多的是来自中原和万国。郭沫若在为成都杜甫草堂题写的那副楹联中，对杜甫作出公正的评价：“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

向以鲜说，这位心怀巨大怜悯之心的诗人，对苦难有着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怜悯和同情心是人类所拥有的一种最珍贵也最广袤的情感。杜甫民胞物与的情怀，不仅体现在对人民的热爱与怜悯上，更体现在对自然热爱与钟情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刘珈汐